

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的问题

李 德 彬

实行对外开放,使我国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的历程,总结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将有助于解决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一、引进技术设备的必然性和渠道问题

新中国的经济是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烂摊子起步的。以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来说,第一,数量少。1949年,我国仅有工业固定资产128亿元,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很少,原煤0.32亿吨,原油12万吨,发电量43亿度,钢15.8万吨。平均每人占有钢产量0.29公斤,与外国比,美国人均占有钢产量为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453.6倍。第二,畸形发展。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总产值占73.6%,重工业总产值占26.4%,因为旧中国的工业多数是纺织、面粉和卷烟工业。为数极少的重工业,它的内部结构也是畸形的,帝国主义从旧中国掠夺大量的铁矿和生铁,而中国连一根钢轨、一吨优质钢材都要从外国进口,一句话,缺乏基础工业和制造设备的机械工业。第三,生产技术水平很低。反映一个国家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机械工业中,在旧中国,多数是从事机器修理的小工厂,1949年全国一共生产1,582台普通机床,和一些小型发电机,单机容量(衡量电机工业的技术水平)大的不过几百千瓦,这些发电机的总发电能力才10,181千瓦。更为严重的是缺乏技术人员和专家。这样的工业基础,如果不引进技术设备,要迅速发展经济是有困难的,也不知道要经历多长的时间。

1950—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奇迹般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我国当时所处的环境,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基本建设,在民用和军工方面建立起一批大型的骨干企业。既然要建立起一批大型的骨干企业,就必须为这批大型的骨干企业提供成套的技术设备。当时,我国的工业能做到吗?1952年,我国钢产量虽然达到135万吨,机械工业在制造设备的能力上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开始扭转了旧中国机械工业只修配外国设备的局面,通过测绘仿制,能制造一些较大的设备,如50吨吊车、1,250马力水泵、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300马力柴油机,等等。但是,要为大型的骨干企业提供成套设备,不但有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所说:“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能力”。这说明,要想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现工业化这个宏伟的目标,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是不可能的。那么,从什么地方引进技术设备呢?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人类都有过它的贡献。这就决定了我国引进技术设备应是多渠道,而不是局

限于某一个国家。在建国的前夕和初期，我们曾设想要从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引进技术设备。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郑重地向全世界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一重大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针，又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坚持执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政策，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的方针政策也是这样。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所指出的，“不独是和苏联，就是和其他新民主国家以至某些资本主义国家”，

“不独是办合股公司，以至实行某些事业的租让，在原则上都是许可的，在事实上有时也还是需要的”^①。所有这些说明，当时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绝对不是局限于苏联和东欧。

为什么后来引进技术设备的渠道仅限于苏联和东欧，变成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外苏联东欧开放”^②？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一边倒”的结果。“一边倒”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毛泽东同志根据孙中山先生积40年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28年的经验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同志关于“一边倒”的思想指的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这是《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基本思想的继续。关于建国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已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如果认为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局限于苏联、东欧，是由于提出“一边倒”的结果，显然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一边倒”的误解，与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我们知道，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之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支持蒋介石封锁和轰炸大陆。1950年夏天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以武力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并封锁我沿海；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我国实行“禁运”；1949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全名“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机构在美国的控制下，监督参加国对苏联、东欧的禁运）于1950年宣布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又设“中国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国的“禁运”。历史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妄图扼杀新生的中国。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愿意为新中国提供技术设备。这就是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和对外开放局限于苏联和东欧的原因。

二、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和特点

五十年代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的时期。建国不久，即着手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其中，签订了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贷款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

机器设备与器材。可以看出，这个贷款协定着眼于引进设备。事实上，贷款条约签订后，苏联立即开始为我国的企业进行设计。1950—1952年的三年中，为我国设计的项目达50个，其中，签订定货合同的只有一部分，如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这三大工程于1950年开始设计，1952年破土动工，1953年11月先后竣工投产。1950—1952年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的数量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还处于恢复的阶段，并且全国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恢复，为“一五”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准备。

“一五”计划开始不久，1953年5月，中苏签订的经济协作规定，连同过去三年来为我国设计的50个企业在内，到1959年为止，我国将从苏联引进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技术设备，用于新建和改建。后来，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不断增加，1955年7月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一五”计划时，引进大型的技术设备项目已增至156项，所以说，“一五”计划是从苏联引进的156项为中心，实际上，“一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从苏联引进大型的技术设备项目又增至166项。另外，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技术设备68项。^③

1958年和1959年，与苏联又签订了引进技术设备的两个协定：1958年的协定规定引进的项目为47项；1959年的协定规定引进的项目为78项。这两年，还与东欧国家签订引进技术设备40多项的协定。^④

“一五”期间，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协定的执行比较顺利，这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我国提供友好援助的结果。周恩来同志说过：“他们的热情和友谊是我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⑤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霸权主义，妄图中断供应中国的技术设备，以压服中国屈从于他，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于是，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片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原子能研究方面的两国协议，并撤走这方面的苏联专家，并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因此，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在被撕毁的600个合同中，属于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的有343个，在1960年7月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⑥，大量减少和停止供应我国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并逼我还债。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严重地扰乱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破坏了我国与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十年代初期到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时，我国从苏联东欧引进设备概况如下表：

设备来源	设备类型	数量（项）	建成或基本建成（项）	废止合同（项）	我国继续建设（项）
苏联	成套设备	304	149*	89	66
苏联	单独车间和装置	64	29	35	—
东欧国家	成套设备	108	?	?	?
东欧国家	单机	82	?	?	?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1984年第9期编制。

* 其中建成103项。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技术设备引进的重点是加强重工业的建设。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各个主要工业部门都有引进，但是，重点是加强重工业的建设。因此，引进的技术设备集中于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

第二，技术设备的引进是多层次的。五十年代的引进，虽然成套设备的引进占了89%的用汇，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五十年代不重视技术的引进，恰恰相反，五十年代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很重视技术的引进。五十年代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方面的资料5,000多项^⑦，还聘请了苏联东欧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派遣人员去苏联东欧实习，以掌握引进设备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所以，五十年代不但引进设备，而且引进技术；不但引进技术，而且引进人材和管理方法。

第三，引进技术设备与利用外资相结合。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共用汇27亿美元^⑧。由于引进的时间基本集中于“一五”和“二五”的前两年，平均每年引进技术设备的用汇将近4亿美元。“一五”期间，我国每年的出口总额仅13.66亿美元^⑨，我们必须用这笔有限的外汇进口大量急需产品，如钢材、化肥和汽车等等。可以这样说：我国当时的出口能力，担负不起巨额的技术设备的进口，1950年初我国与苏联商谈贷款协定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经过与苏联谈判的结果，凡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费用，一部分使用记帐外汇和贷款支付，因此，五十年代我国使用苏联的贷款78亿旧卢布（当时折合19亿美元）^⑩。五十年代我国使用了大量外资，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引进成套设备。可见，引进技术设备与使用外资相结合，是五十年代引进工作的一个特点。

三、引进技术设备的作用和经验

五十年代我国从苏联东欧引进技术设备的历史作用，不应因为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而全部否定。历史事实说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五十年代引进的技术设备起着一定的作用。

第一，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4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其中，机械工业不到2%。根据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如果不建立一批现代化的重工业骨干企业，不但不能改变旧中国遗留下的畸形工业结构，而且，也不可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五十年代我国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了一批大型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又集中国内的主要力量，建设这批工程。结果，我国在短期内建成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而过去又非常薄弱或根本就是“空白”的基础工业，初步形成了各种设备的制造行业，其中，有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炼油和化工设备制造业等等。“一五”期间，我国还不能制造大型的精密设备，机器设备自给率的最高年份才达60%左右。

“二五”期间，机器设备自给率已提高到80%，其中，包括过去不能制造的精密机床和大型机械。接着，我们还制造了原子能、合成氨、十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等设备。这些成就固然是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是，同五十年代引进一批大型的成套设备、建立一批大型的现代化骨干企业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

国。”^②实际上，五十年代引进大型的成套设备而建立起来的骨干企业，不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吗？

第二，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

建国时，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比，差距非常大。世界上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几乎都没有；同类工业的技术级别相差极大。至于工业产品的产量，如钢铁、原煤、原油，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要落后一百年到一百多年。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强调自力更生，但不是把自力更生片面地理解为一切靠自己，企图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当时的一切技术经济问题；而是采取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速经济的发展，以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五十年代我国大规模从苏联东欧引进技术设备，对我国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起了这样的作用：

首先，建立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化工、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等，这都是我国的新兴工业部门。这些部门都是引进国外已经开发，并在实际生产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业生产技术，这就节省了我们从头摸索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们的人力物力。以化学纤维来说，人们从事化纤的研究开始于1655年，先后经历了二百年，才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又经过长期的试生产，才正式投产。我国于“一五”期间从东欧引进年产五万吨化纤（粘胶）的成套设备，建设了保定化纤厂。接着，我们根据这个厂的经验，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而建立一批化纤（粘胶）厂，年产量达12.8万吨。外国用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的化纤工业，我国通过引进，几年就建立起来。

其次，大量引进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的资料。这些资料起什么作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很快，平均每年增长18%。在新增加的产值中，约占70%是原有企业的增产^③。原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又很低，要迅速增加产量，就需要解决许多生产技术问题，而新建和重大改建的企业也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一时期，从苏联东欧引进的大量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帮助我国许多经济部门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关键性问题和许多技术的困难”^④，对于提高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提高自己的设计能力。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建设一个大型工程项目，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成套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基本上由供应设备的国家负责。1958、1959两年与苏联签订两项关于125个新建和扩建工业企业的协定，其中大部分项目将由我国自己勘察、设计，仅由苏联供应主要的设备。我国工业技术设计水平提高这样快，与“一五”期间大量引进技术设备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虽然，五十年代我国引进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当大，但是，我们既没有把引进当作权宜之计，也不把引进当作“洋拐棍”，依赖它过一辈子，而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所以集中主要力量，重点建设重工业，就是为了在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很重视科技成就与生产经验资料的引进，很重视提高引进设备的国内分交额，很重视成套设备制造能力的配套。如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引进时很注意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制造能力的配套，这样的引进，很有成效地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1952年我国只能生产3,00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1957年我国已能够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立装机66.25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了。又如核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我们知道：核工

业是建立在范围广泛和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上的,如果我们采取闭门造车,不利用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在短期内建立核工业,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那是有困难的。我国在核工业建设的初期,曾积极争取国外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上给予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并从苏联引进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1958年建成投入运转^④。另一方面,由于霸权主义采取核讹诈和核垄断政策,如果我们缺乏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要掌握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技术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引进的关系,以引进来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结果,出现这样的情况:1959年6月苏联首先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撕毁两国协议,撤走了专家,并扬言说:“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十五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⑤可是,仅仅到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两弹”爆炸中间仅隔两年零八个月,快于苏联、英国和法国。“两弹”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引进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第四,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国防工业。

恩格斯说:“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⑥。从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来说,还不具备生产现代化武器的工业基础。因此,五十年代我国在引进民用工业的同时,很重视国防工业的引进。通过引进和国防工业全体职工的努力,只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建立了飞机、坦克、重型火炮、雷达、炸药等一批大型骨干工厂,使我国国防工业初具规模,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开始国产化,1959年国庆阅兵典礼的受阅部队,全部装备着国产的武器。

如上所说,五十年代我国引进的技术设备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大型的骨干企业,经过不断的改造和扩建,至今仍然起着骨干的作用。但不能夸大为:“中国现在的工业水平仍然是五十年代的水平”,“仍然是五十年代的那些工业”。持这一观点的人,不是对中国的无知,就是对中国的偏见。到了1960年,我国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而建成的企业仅有103个,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工业统计年报的资料,到1983年,我国大型的工业企业已达1,652个。再以汽车工业为例:“一五”建成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年设计生产能力仅3万辆,汽车的型号是三十年代美国万国牌的仿制品。六十年代以来我国自行设计,先后建成“二汽”等一批汽车厂,1984年汽车的年产量达31.5万辆^⑦。所有这些,不能说仍然是五十年代的“那一些”和“水平”。

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作用,与我们在引进工作中的一些正确的做法有关:

第一,做好引进和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

五十年代引进的成套设备都是逐个项目摸清情况,对技术情报仔细进行分析,认真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工艺技术力求先进,经济效益力求比较好,而且必须适合我国的国情,为我国所需要。

引进项目确定后,严格按基本建设的程序办事,首先做好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然后进行设计。这一过程,从计划任务书的编制,一直到设计方案的审查,都经过反复研究论证。五十年代引进技术设备项目,除了极少数之外,绝大部分的建设周期都比较短,基本建设投资回收期也比较短。

第二，做好引进项目的综合平衡工作。

“一五”期间，很重视从苏联东欧引进技术设备项目的综合平衡工作。首先，集中了财力、物力、人力进行以“156”项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相当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如果不集中适当的财力、物力、人力进行重点建设，显然是不行的。虽然，当时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综合平衡，有一定的缺点，但没有搞“以钢为纲”，挤掉轻工业和消费。其次，统筹安排引进项目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特别是与基本建设、能源交通、物资供应的综合平衡。同时，也很注意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国内配套工作，从苏联引进的“156”项，“一五”期间开始开工的有145项，国内投资110亿元，与这些工程配套的国内设计项目，五年内投资共18亿元，其中限额以上的工程项目即有143个^⑧。因此，保证了引进设备的工程能按计划完成，引进项目的绝大部分建成之后，即可马上投入生产，形成新的生产力，并较快地收回了投资。以机械工业为例，“一五”期间建设的重点企业，周期一般仅3年左右（长春第一汽车厂1953年7月开工，1956年10月竣工，只用了三年零三个月），而“文革”期间，一般是8年以上。投资的效果也比较好，一般平均投资回收年限为3.5年，即从开工之日开始，平均不到7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第三，重视引进成套设备的国内“消化”。

五十年代我国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对这些进口的成套设备能否“消化”？这关系到引进工作的成败问题。为了“消化”和创新，当时采取了很有成效的措施：一是，引进设备的同时，从苏联和东欧各国引进5,000多项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方面的资料，与苏联合作，共同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二是，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10,800多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1,500多人；与此同时，我国派遣大量人员出国实习和培训，其中派到苏联去的就有8,000多名。三是，争取较高的“分交”额，也就是说，进口的成套设备中，争取“分交”一部分在国内制造。这不仅是为了节省外汇，更重要的是提高我国工业的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有利于“消化”引进的设备。据统计：“156”项的国内“分交率”，按设备重量计算占52.34%，按设备的金额计算占45.9%^⑨，其中，武钢的“分交”率分别占58%和54%。四是，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引进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由于采取的措施得当，引进的成套设备投产后，一般都能够正常运转，达到和超过原设计生产能力。能“消化”，就能够测绘翻板。由于五十年代我国比较重视引进成套设备的国内“消化”，加上测绘翻板工作组织得比较好，因此，五十年代的测绘翻板工作相当出色，加速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五十年代我国引进技术设备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

首先是，有的同志对苏联的东西过于深信。从深信不疑发展到迷信，结果，必然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甚至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已经暴露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搬到我国来。更加严重的是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不是面向全世界，更不敢去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1952年奥地利的钢铁厂使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获得成功，日本钢铁界经过周密的调查，认为这项新的炼钢技术将代替平炉炼钢法，成为世界炼钢技术新潮流，1955年日本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建立氧气顶吹转炉，并不断地淘汰平炉，使日本钢的产量急剧增长。1956年奥地利曾主动向我推销过这项技术，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没有及时引进这项技术，而是在苏联的援建下，在新旧钢厂继续建立落后了的平炉。同时，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也多是照办，

而不是认真开展讨论，予以必要的修正，以致出现了三门峡水电工程没有达到应有效益，还留下不少的后患。又如采矿冶炼业中对于伴生矿的处理，由于事前对地质的勘察和设计不周（当然，也有技术水平的问题），结果，抓了铁，而丢了极为宝贵的稀有金属。

其次是，对苏联的经济关系过于紧密。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建国后的十年，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约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75%^②，同期，我国引进的技术设备几乎百分之百从苏联东欧引进，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苏联。对外经济关系过于依靠某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是对外贸易不能“货比三家”，难免要吃亏。二是引进技术设备不能博采各国的长处。当时，要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五十年代，我国就从丹麦引进水泥的生产线，奥地利曾向我推销过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三是一旦关系破裂，后果严重。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必要过于依赖某一个国家。五十年代初期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调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代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极为迅速，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也在变化之中，固定地认为“某国第一”，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观点。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将是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经济关系的对外开放。

注：

① 1950年4月5日《人民日报》。

②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

③④⑤⑦⑧⑬⑭ 《辉煌的十年》，上册，第51、415、422、415、424、425页。

⑥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第7页。

⑧ 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IV—131页。

⑨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420页。

⑩ 《光辉的成就》，上册，第91页。《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一书认为从苏借进的贷款共14.27亿美元。

⑪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⑫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190、31页。

⑭ 198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⑮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64页。

⑯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⑰ 1982年3月19日《人民日报》。